

# 文件检验参考资料

WENJIAN JIANYAN CANKAO ZILIAO

第三辑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 文件检验参考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注意保密)

一九八五年十月·沈阳

## 编 选 说 明

一、本资料是为配合我院文件检验专业的教学而编辑的，也可供有关院校和文检技术人员教学或学习之参考。

二、本资料所收论文，大多数是在国内刊物发表过的，少数选自专著和“文件汇编”，个别未发表。

三、本资料所收论文，除个别地方有所改动外，文字均依原版排印。各篇文章使用的字母音标，仍照原样，没加改动。

四、本资料一九八五年予计出三辑。以后，将不定期陆续汇编印行。

五、编者水平所限，编辑中缺点错误一定不少，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些。

中国刑警学院四系文检专业

## 目 录

语言学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邱大任(1)
简论案件言语识别	岳俊发(16)
语言侦破漫话	邱大任(29)
语言分析在侦察破案中的应用	邱大任(47)
方言知识在刑事侦察中的运用	袁之宜(57)
如何通过案件的语音识别判断作案人的所在地 区或籍贯	岳俊发(68)
怎样分析案件的语音	邱大任(83)
同音别字及其在案件言语识别中的应用	康殿文(93)
“日”母字的读音、同音字及其在侦查语言 分析中的应用	岳俊发(105)
浅谈运用方言别字分析作案人的所在地区籍贯	刘贊军(123)
运用上海方言特征在侦查犯罪文件书写人中的 作用	陈鸣光(129)
从人名判断南北籍贯	邱大任(136)
精神病患者的书面语言分析	邱大任(140)
精神病患者书面语言管见	李晓明(149)
浅谈精神病人作案的特点和笔迹特征	刘光明 陈晓然(154)
聋哑人生理、心理特点和书面言语特征初探	岳俊发(173)
从侦破“四五”反动传单案看聋哑人书面语言 特征	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八处(188)
“虎妞”给予的启发	李晓明(194)

声学在刑事侦察工作中的应用	周建华(197)
声纹	韩少燕 赵元龙(201)
声纹鉴定技术	张 鸣(206)
国际声纹学浅谈	安天柱(210)
声波纹鉴定	于春富(212)
浅谈声纹图解法	铁大军(219)
微小痕迹与声音的鉴定识别	栗红林(222)

### 分析案情，刻画作案分子的特点

.....	公安部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文检组(226)
反革命标语、传单、信件案的案情分析	康殿文(249)
怎样分析判断案情，确定侦察方向	杨新宝(277)
如何通过文字特点推断书写人的年龄	胡景云等(293)
确定嫌疑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武 汉(301)
试论案情复析	武 汉(310)
刑事案件中人、事、物的辩证关系	黄 石(318)
信息与侦察方向和侦察范围的确定	高 峰(322)
谈信息理论在刑事侦察中的运用	潘梅林(330)
刑事侦查中的几种归纳法	阳作洲(337)
刑事侦查中怎样运用假言推理	阳作洲(344)
在刑事侦查中怎样运用选言判断和选言推理	阳作洲(353)
在反标传单信件案件侦破中怎样运用假说	康殿文(360)

# 语言学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邱 大 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我不是作什么报告。北大的语言学老师，在语言学界都是很有名望的，北大的同学基础也都很深厚，我本来不敢来讲。因为我们过去多次到北大来，请北大的老师帮助我们分析案件，象王福堂老师就给过我们多方面的支持，所以这一次王老师和张老师让我们来介绍介绍工作，我们也不敢“得罪”。我们就随便介绍一点我们的工作情况吧。

我也是学语言的。过去进大学中文系的，一般都不愿意学语言，都想学文学。认为学文学不错，有兴趣，什么记者呀、作家呀，很有吸引力；认为学语言枯燥，一看见国际音标就烦得慌，所以学校在分专业的时候很费劲，动员哪！我却不这么看，上大学开始，就对语言发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当时，我们经常讨论语言学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语言学怎么用到现实建设中去。大家你一条我一条就凑哇！语言学能为研究汉语史、研究汉族的历史服务，为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服务……列举了不少。有的同志还谈，编汉语大字典、大辞典，都需要方言学。当时就是没有想到语言学还能用到公安工作中去，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学部给砸烂了，我们都到了干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调进了公安局。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在公安局工

作。搞什么工作呢？就是分析案件的语言。下面就讲一点语言学在公安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 第一部分 语言分析是公安工作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

同志们都经常看侦查影片，都知道一发生案件，公安局的同志就要立即赶赴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侦察人员要根据罪犯留下的各种痕迹对作案分子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地区和特点。刑事技术称之为“定向”、“画像”，目的是为查找作案分子提供线索。在作案分析留下的东西里面，有的是书面语言材料。我们就是对这些书面语言材料进行分析，从而为侦察破案指出方向。我举一个例子：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厂的一个宿舍里，住着一位工程师。去年的一天晚上，这位工程师回家，一推门发现地上多了一张纸，拿起来一看，吓了一大跳。纸上写着：×月×日你给我送一百元钱，放在楼底下的×××号信箱里，若是不送，咱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工程师挺害怕，就把信交给了厂保卫部门。后来，这封信送到了我们市局。我们要根据这封信上的语言文字特点进行分析，确定作案分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大人还是孩子？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文化程度如何？侦察员要根据我们的分析去查找这个人。同学们看看，语言学在公安工作中还真有用处吧？再举一个例子：

一九八二年十月初的一天，丰台区黄土岗有个老头儿突然失踪了。过了好多天，老头儿家里人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说：

“家里对主人不放心吧，我跟他说好了，我让他到我们那里干一、二年，挣一大笔钱回来，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家里人不知道老头究竟到哪儿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在黄土岗附近发现了老头儿的尸体，尸体已经腐烂。这是一起谋杀案。公安局根据什么破案呢？要运用各种刑事技术手段判断凶手是怎样一个人。可是

山西人杀人和北京人杀人，都是一个样子，分不出来，那么怎么去分析判断呢？这个时候语言学就很有用了。我们看了信，对书面语言文字材料进行全面地分析，然后告诉侦察员，罪犯就是黄土岗人，25岁左右，初中文化，是个农民，还有一个特点，罪犯和老头儿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关系，或是熟人，或是其它一种什么关系。侦察员根据我们的意见去找，半月以后，案就破了。罪犯宋子华，确实是黄土岗人，初中毕业，农民，是老头的一个远房亲戚。因为他欠老头儿钱，没法儿还，想了这一招，把老头儿杀害了。同学们看，语言学在公安工作中确实挺有用，若不然荒山野地一具尸体，罪犯不好找哇。犯罪分子也没想到，就是一封信把自己暴露了。当然，也不能说没有语言分析就找不到罪犯，但是有了语言分析就给侦察破案提供了更多更具体的线索。

所谓语言分析就是运用语言学的有关知识对那些利用书面语言进行犯罪活动的案件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进行分析。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判断作案人的民族、性别、籍贯、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历、经济状况、定居地点和主要活动范围。

语言分析在我国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当时主要是对一些方言词进行分析。譬如有这样一个案子：作案分子约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见面，接头暗号是“戴一顶裁绒帽子，手里拿着捌棍”。

“裁绒”北京人都懂，就是“长毛绒”。“捌棍”是什么呢？是不是“拐棍”的“拐”写错了呢？这个东西非得搞清不可，侦察员去抓人得看暗号哇！戴长毛绒帽子的街上很多，还得把这个棍子看准了，否则就漏掉了。我们告诉侦察员，“捌”是“扒”的错写，“扒”字他不会写，写个同音别字“捌”。“捌棍”是个什么东西呢？在通县靠近白河一带有这种东西，就是三、五尺长的一根棍子。它有个用处，走夜路轰个狗哇，防个身哪，枣熟了捅个枣哇，都用它。潮白河这一带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种扒棍。侦察员到那一带调查，确实如此，不久就在那找到了这个人。

公安机关一看语言这门科学还真有点用，慢慢儿地，侦察员发现一点语言问题就问一问，就分析分析。这样，语言学就逐渐地运用到了公安业务当中。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语言分析发展了，不单是分析方言词，而是全面对书面语言进行分析。这门技术手段越来越为侦察和技术人员所重视。目前，这还是一个秘密武器。别看作案分子很嚣张、很狡猾，他还不知道我们怎么对付他。他越玩假的，就越容易暴露他的特点，他不好伪装。

语言学用于公安工作，不只是我国有，外国也有。日本电影《人证》、《沙器》里就有反映。《沙器》中，调车场上一个老头儿死了，当时侦察员确实是没有办法。唯一的一点线索是从酒吧间服务员那儿知道老头儿昨晚来喝过酒。追根问底，得到一点情况，老头儿说话带一点“斯斯腔”。侦察员从斯斯腔入手，查到了岛根县，最后把作案分子和贺英良找着了。由此看来，国外刑事技术上，也是用语言学的。

分析案件语言不能单打一。光凭语言分析，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不行。一个案件情况是复杂的，分析案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除了语言学知识以外，还需要哲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生理学、精神病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知识。另外，语言分析也必须同公安工作中的一些其它技术手段紧密结合起来运用。这样，效果就会更好。

语言分析本身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今天我主要给同志们介绍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用方言学知识判断作案分子的籍贯、地区。

## 第二部分 分析语音

语音是最能够表现方言特点的，人们对语音也是最敏感的。没有学过语言学、方言学的人，对语音也都非常敏感。“你吃了饭吗？”这样一句话，各地说法就不一样：

北京说：你吃了饭了吗？

“ni<sup>tʂ</sup>·l·l<sup>v</sup> fan<sup>³</sup>·l<sup>v</sup> ma?

沈阳说：你吃饭没有？

“ni<sup>tʂ</sup>·l<sup>v</sup> fan<sup>³</sup> ·mei<sup>⁹</sup> iou?

山西说：你吃啦饭啦没啦？

“ni<sup>tʂ</sup>·, ·la fæ<sup>⁹</sup>, ·lam a<sup>⁹</sup>, ·la?

重庆说：你吃了饭没得？

“ni<sup>tʂ</sup>·l·nofan<sup>³</sup> ·mei te?

上海说：侬饭吃过了呒没？

“nɔŋ<sup>²</sup> vɛ<sup>²</sup> tʂ<sup>¹</sup> iə<sup>⁹</sup>, ku<sup>⁹</sup> lə<sup>⁹</sup> , m<sup>²</sup>mə<sup>⁹</sup>, ?

广州说：你食饭未？

“nei<sup>⁹</sup>ik, fan<sup>²</sup> mei<sup>⁹</sup>?

这里边有词汇、语法问题，但主要是语音问题。语音既然如此之重要，我们分析语言时就不能把这个重要条件放过。我们分析的主要是书面语言。分析直接的口语材料是很少的，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在书面语言中把作案分子的语音特点找出来。虽然书面语言的语音这个物质外壳脱落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加以探讨。通过实践，我们确实找到了一点办法，这就是通过同音别字来判断语音。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内部规律，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同音字。两个字在北京话里同音，在上海话里不一定同音。通过同音别字就可以判断方言特点，从而确定作案分子操的是哪一个地区的方言。举个例子：上海话“黄”、“王”，不分的，都是浊擦音、阳去字，读为 [fhuā<sup>²</sup>]。有一次坐火车是同我坐在一起的两个上海人，他们本来不认识，一开口音，两个认老乡了，就聊起来了。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侬姓啥？”

“阿拉姓黄 [fhuā<sup>²</sup>]。

“侬是草头黄 [fhuā<sup>²</sup>]，还是三横王 [fhuā<sup>²</sup>]？”

“阿拉草头黄”。

我住在上海的招待所，有一天吃饭，有一个菜是“炒王瓜”。排队的北方同志就议论开了，这是个什么菜呢？不大清楚，以为上海出了一个什么新的菜。其实就是“炒黄瓜”，他把“黄”写成了一个同音别字“王”，这说明，同音别字在一个方言区里，总会表现出来，特别是文化较低的人很容易写同音别字。不同方言区有不同的同音字，因此不同方言区的人就会写出不同的同音别字，由此我们便可以捕捉到作案分子的方言特点。

方言区语音特点举例：

例 1

小小玩叶（艺）儿 （1）

尊（珍）惜时间 （2）

省吃小（少）用 （3）

扎（摘）掉帽子 （4）

(1) “艺”写成“叶”，反映出北京的语音特点。“艺”音是[i]，“叶”是[ie]，北京话儿化以后，韵母都变成了[iər]。所以，北京人写“艺”的时候，胆子很大，干脆就写成了“叶”。广东人就写不出来。两个音差得很远。(2) 是重庆话，把“珍”写成了“尊”，重庆“珍”的u介音脱落，与“尊”同音了，一看这个，它绝不会是北京话。(3) 是广州话，“少”写成了“小”。在广州，[ts]组、[tʂ]组、[ʈʂ]组这三套音变成了一套音，[ts、ts、s]、[tʂ、tʂ'、ʂ]、[ʈʂ、ʈʂ'、ʂ]混在一起了。广东说“西红柿炒鸡蛋”是[.ʃai-.hun-.ji-.ʂau-.kai-.ʂi]。以前我在语言所的时候，那儿有不少中山大学毕业的同志，他们说完了“西红柿炒鸡蛋”。我们就给他们补充，说：你自己炒自己吃吧[.nei-.ʂi-.kei-.ʂau-.ʂi-.kei-.hɛ-.pa]。(4) “摘”写成“扎”，这两个字北京音差得很远，可是在吴语区里，它们都是入声字，韵母也只有一点差别，一个是前a，一个是后圆唇o，你一听就知道是吴语方的特点。

那么，怎么具体的同语音字来分析音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语音类别的比较。看分不分边音鼻音，分不分平舌音、卷舌音，分不分前鼻音韵尾、后鼻音韵尾，分不分尖团音，日母的读音怎样，舒声韵跟入声韵混不混等等。

例 2 69年北京的一件书面材料有以下特点：

索性 花了钱。

勃涅（列）尔（日）列（涅）夫

“索性”、“花了钱”是词汇特点。“索性”南方用得比较多，北方一般说“干脆”。“花钱”是北方特点，南方多说“用钱”。光凭词汇分析，既有南方特点，又有北方特点，不好下结论。“勃涅尔列夫”反映语音特点，它把籍贯地区暴露得非常彻底。“列”与“涅”互换，说明作案分子边音〔l〕、鼻音〔n〕不分，边音、鼻音不分有哪些地区呢？兰州、重庆、贵阳、武汉、南京、福州等地都不分。从全国到这六个城市，范围缩小多了。还有一个语音问题，“日”母字念得很怪，念成了“尔”音。有这个特点的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武汉。把两个特点综合起来考虑，只有武汉。所以，我们认定作案分子是武汉人，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不久就破案了。罪犯确实是武汉人。十几年以前来北京的。再举一例：

例 3 78年北京的一件书面材料有以下特点：

一双被子

大量物质（资）

在纸（紫）禁城内

前一个是有词汇问题，后两个是语音问题。“被子”说“一双”比较怪，说一双鞋、一双袜子可以，被子能说“双”吗？没听说过。把“资”说成“质”，一说明没有入声，入声跟舒声是混的，再一个是平舌音和卷舌音是混的。把“紫”写成“纸”，再次告诉我们，作案分子的平舌音和卷舌音是混的。根据这些特点，再结合其它情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作案分子是北京人。

平、卷舌音不分，在北方，东北最明显，主要是沈阳、长春。我们又了解“一双被子”，开始在北京打听，都说不知道。后来我们打电话给沈阳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调查，结果在沈阳的周围县发现有这种说法。据此，我们判定作案分子是沈阳周围地区的人。这个范围就缩小多了，原来是大海捞针，无从着手。由于发案在某个具体单位，就在那个单位找辽宁人，特别是找沈阳周围地区的人，所以三天就把这个人找着了。一搜查，在作案分子的床底下有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信里还是写“一双被子”。我这一看，就说：这个没错，就是写的“一双被子”。它不是孤立地出现一次，说明这个地区确实是这样说。这是比较平舌音和卷舌音。

例4 1973年7月北京发现的一件书面材料有以下特点：

讨吃要饭

工资绝(足)够用了

红(昏)头转向

把“要饭”说成“讨吃要饭”。南方人一般说“讨”，“要饭”说成“讨米”。“足够”说成“绝够”，“足”[təyəʔ]与“绝”[təyəʔ]同音，说明作案分子是在有入声的地区，没有入声地区这两个音肯定合不到一块儿。把“昏”（或是晕）写成“红”，说明前鼻音韵尾[-n]和后鼻音韵尾[-ŋ]混到一块了，“昏”、“红”都读成[exuŋ]。并起来看，作案分子所在地区，不但有入声，而且前、后鼻音韵尾相混。哪些地方有这些特点呢？从北方看，山西话是符合的。山西人[-en]和[-eŋ]分不清。“临汾”说成[cлиcхун]，听起来人家还以为是“离婚”呢。“讨吃要饭”经过了解，张家口地区说。张家口话跟山西话基本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判断作案分子是张家口地区的人。过了不久，在张家口地区的阳原县把这个找着了。

例5 从1970年10月至1974年2月，在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佳木斯市，先后发现一人所写的十件书面材料，有以下特点：

喇喀　屯子　二妮子

因（任）何 不于（如） 破护（获）

畅通无阻（阻） 白痴（面） 弄（买） 岌（县）

“唠喀”是东北话，即聊天；“屯子”也是东北话，即村子；“二妮子”，有的地方叫“二妮儿”，就是二闺女、二姑娘、二女儿，河北、山东河南都说。从词汇特点分析，书写人有东北话，又有山东、河南、河北话，因此很难断定。把“任”写成“因”、“如”写成“于”，在东北和山东胶东地区都可能出现，把“获”写成“护”，在东北就不行，只有在胶东地区同音〔xu<sup>3</sup>〕。由此看，作案分子既有东北话，又有胶东话。这个案子发生在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和佳木斯市，物证涉及佳木斯市和集贤县。经综合分析，我认为“破护”这个语音特点最有价值，“因何”、“不于”两个特点是共同的，“唠喀”等词汇是可以学到的，因而判断作案分子是胶东人，现在双鸭山附近。因此，我们建议当地公安部门在双鸭山、佳木斯市和集贤县找胶东人。“姐”、“痴”、“弄”、“县”写法很特殊，说明作案分子念过旧学，是个老家伙。此外，材料还有些行业用语，什么“高空工作服”、“地面工作服”。最后，我们告诉双鸭山市局的同志，在双、集、佳一带找胶东人，年令50岁以上，念过几年私塾，早年闯关东，是个体力劳动者。结果，不到一月就从双鸭山附近的集贤县把作案分子找着了。作案分子胶东掖县人，55岁，早年去东北，集贤县一个装卸队的工人，确实念过几年私塾。

上面是从声母、韵母上分析，下面从声调上分析。

例 6 80年3月在上海发现一件书面材料，有以下特点：

不行 孩子 什么时候 写不上几个字就被打断了

能否给我带一个收录两用好一点的机器

青菜买（卖）到两毛多一斤

第一行是北方话特点。“写不上”，“说不上”，“找下了”，“上”和“下”这种用法北方人用得很习惯，南方人就不大说。“能否给我……”一句同北方话就不大对味。北方人习惯是把

“好一点”放在“收录两用”的前边，南方话常是放在后边。语法南北有差异，词序在各方言里不一样。我是南方（四川）人，非常注意学习普通话，语音掌握得还好，可是语法老是不大注意，“给你书”，我总习惯说“给书你”。把“买到”写成“买到”，“买”、“卖”分不清。什么地方不分呢？在吴语区里，上海、苏州，这两个字都念[mɒ²]，阳去字。阳上、阳去都念阳去了。当时有两种分析意见，一些人认为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受南方方言的影响，我们则认为是南方人到北方受了北方话的影响。到底去哪儿找这个人呢？事情发生在上海，是在上海找还是去北京找呢？这就要求非得确定作案人的主要方言不可。我们认为“买、卖”不分这个特点最能反映作案人语音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判断是吴语区的人，江苏或上海人，后来到了北方，受了北方话的影响，所以他能够写出北方方言的一般词汇。我们认为应该在北京找这个人。半月之后，就在北京某个单位找着了这个人。作案分子是江苏丹阳人，他长期住在上海，在工业学校念书，毕业分到北京工作，在一个研究所当技术员。

从语音判断方言是最准确的，伪装起来也很困难。下面举一个语言伪装的例子。

例 7 78年5月，北京某医院发现一人所写的两件书面材料，有以下特点：

小子 你气急败坏的劲可笑 你们听者（着） 不行

小毛毛 小丫（伢）子 狗胆哟 你说嘛 姚（饶）

从第一行看，北方话说得不错，“着”与“者”同音，“不行”，也是北方话特点。但是第二行却是南方话的特点。“小毛毛”，老北京不说，南方人（江苏、上海）爱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小丫（伢）子”，江西、湖南说，当地人念[.ja]。如此，这个人南腔北调，到底是哪里人呢？信是写给他们单位领导的，这个领导姓“饶”[ɛzau]，他写成了姚[.iau]“饶”、“姚”不分，沈阳比较突出，这个特点是最本质的。我的分析意见是：

在你们单位（指发案单位）找来京之前长期住过沈阳的人，这个人在北京的年头也不少了，有个十年廿年了，50岁左右，高中文化，不象个医务人员（发案是北京的一家部队医院），是个行政干部。三个星期以后，就把这个人找着了。这个人少年时代住在沈阳，资历还不浅，地位也不低，正是个行政干部。我觉得这个语言材料很特殊，就到看守所提审了这个作案分子。他说：我写这封信时就想领导肯定得查，所以我故意降低书写水平，把字写得很坏，写了很多错字。我们邻居的孩子叫小毛毛，电影里有叫“小伢子”的，我就把它们都弄上去了。我想，这样你们就找不到我。他没想到，伪装反倒露了马脚，事情巧就巧在这个“姚”字上了。词汇好伪装，语音则很难伪装。

### 第三部分 分析词汇

汉语方言词汇非常丰富，同学们都能体会得到，有的词在同一个县内叫法就不一样。见于书面的“溜门撬锁”，我从公安业务材料中就见到了如下许多种说法：

- 溜门撬锁 （北京）
- 撬门压锁 （沈阳）
- 撬门破锁 （长春）
- 破门撬锁 （内蒙赤峰）
- 扭门撬锁 （内蒙伊克昭盟）
- 抬门撬锁 （银川）
- 砸门撬锁 （西宁）
- 挖门撬锁 （厦门）
- 撬门揭锁 （安徽巢县）

汉语方言词如此之丰富，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我举个例子，是登过报（《人民日报》80年7月18日）的。陕西省宝鸡市发生的一起盗宝案。一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宝鸡博物馆展览厅文物被盗。作案分子从房顶进入展览厅，共偷了一百八十种文物，有些是国

家的珍品，有一小部分是国家仅有的无价宝。此案必须破获。当地公安机关勘查现场，在房顶上发现两张纸。是作案分子慌忙中失落的。打开一看，是作案分子写给他女朋友的信，一张是草稿，一张是抄清。信上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在陕西给你写信，且就我们俩通过五哥相识后的几天情况，谈谈我对你的体会和看法。我们认识后的第二天晨早，你给我第一个映象……

其中把“早晨”说成“晨早”，我查阅《汉语方言词汇》，广州有此说法。当然，广州只是一个方言点喽，这种说法不仅限于广州。“我们俩”，北京不说，说“咱们俩”，它是包括对方的，“我们俩”不包括对方，因此可以排除北京人作案。在宝鸡也不说“我们俩”，而说“咱们俩”，因此又可排除当地人（宝鸡、西安人）作案。“映象”应该是“印象”，“映”“印”同音，说明作案分子前、后鼻音韵尾不分。这个特点与宝鸡和广州有矛盾，宝鸡、广州分前后鼻音，而与湖南话是符合的。“且就”，广州人口语里有。这就说明作案分子的语音跟广州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完全合得上。因此，我们告诉当地公安机关的同志，这个人是广东或是与广东邻近地区的人，30岁左右，中等文化。结果一个月以后，把罪犯找着了。案犯何进学，湖南宜章县人（宜章县紧邻广东省），25岁，初中文化，是从劳改农场逃跑的一个盗窃惯犯。此次被判无期徒刑。

分析方言词得与分析行业词汇结合起来。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份，北京连续发现五封给蒋特机关的挂勾信。署名“燕北情报局”。信中有“侄子们”、“哥”、“坑子”等词，这是北京话，但不大符合城里话。“虽然”写成“谁然”，与北京城里话有矛盾。我们考虑北京远郊区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我们逐个调查北京周围各县，到了延庆，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当地确有“坑子”的说法。我们判断作案分子是延庆人，45岁左右，初中文化，农民。侦察员去了一个月，辛辛苦苦到处找，但是没找